

第三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论文

## 社会发展与人口控制

董之鹰

研究社会发展与人口控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规律,是发展中国家的一项战略任务。在社会整体运行中,发展与人口控制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人口的增长,与有限的自然资源及发展中的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环境等社会因素之间存在着比例不协调的矛盾。因此,我们应用控制理论,采取计划生育的办法,控制人口出生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必须看到,推行计划生育,特别是在农村,任务十分艰巨。我们还要从矛盾的另一方入手,应用发展理论,加速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过渡,促进科技发展,提高医疗水平,重视文化教育,特别是妇女受教育的程度,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发达国家的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水平,使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协调稳定发展。

### 一、经济因素与人口控制

人口再生产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社会生产力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必然影响着人口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在人口理论中,西方人口学家将人口发展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处于生产力比较落后时期;第二阶段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处于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第三阶段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生产力达到发达水平<sup>①</sup>。第三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模式,要达到这一模式,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人口控制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尚处于第二阶段,但已朝着第三阶段转化。

(一)多生多育的传统生育观产生于生产力低下的自然经济社会。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家庭处于封闭状态,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家庭赋有生育、生产、抚幼、教育、赡老等多种功能。家庭的这些功能必然导致多生多育动机的产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家庭增加财富。人多气盛,财大家兴。在生产力低下的状况,人丁兴旺,带来的是财源茂盛,而不是贫困。多生多育,劳动力多,而作为基本生存投入的成本却很低。许多家庭认为抚养一二个孩子,与抚养四五个孩子所投入的财力、精力差不多。

2. 劳动效益取决于劳动力的数量而不是质量。过去的种植业或养殖业,多为简单劳动,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从事户外耕、牧、渔、狩猎主要靠男劳力的重体力劳动。因此传统家庭所追逐的经济价值,是通过多生儿子来体现的。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定式下,男耕女织,女性的主要功能是为家族延续后代,被称为“生儿育女的工具”。

3. 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世袭制度根深蒂固,家庭财产及特有的劳动技能“传男不传女”,为了延续家族势力,提高家庭地位,农村许多家庭出现“不见儿子不收兵”的局面,加之早

<sup>①</sup> 袁方主编:《社会学百科全书》,1990年版,第120页。

婚早育现象，形成整个社会的高生育率。

(二) 传统生育观的转变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进程中，特别是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传统生育观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家庭功能演变。中国农村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农村产业结构有了较大变化。第二三产业发展迅猛，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将大批农村劳动力吸收到企业中；许多年轻农民走出家庭，投身于都市社会商品经济领域中，家庭经济二元结构比例发生变化。从农村“生产—消费型”家庭结构向城市“收入—消费型”家庭结构过渡，即由家庭劳动力和家庭占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为社会提供产品和劳务，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家庭消费水平逐步转变为家庭成员和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相结合，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分得经济收入，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后一种城市化结构，脱离了小农经济的束缚，使家庭经济功能弱化，赡老的反哺模式受到冲击，多生育并不能带来家庭利益。其次，市场经济对劳动力的配置是以人才取胜。现代社会所从事的科技、经营、管理等工作，属于复杂劳动，要求的不是一般劳动力，而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高素质人才；不是以劳动力的数量取胜，而是以质量取胜。优胜劣汰的人才竞争环境，必然要求孩子成本增大，文化教育、营养保健、文体娱乐等现代生活方式消费增高，使家庭必然要认真计算经济承受能力，考虑优生优育问题。再次，现代人要求提高生活质量。现代生活方式不是小农家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生活，现代人要求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施展自身才华，体现自我价值，置身于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中。因此，多生多育已不是现代人的选择。

我们承认，现阶段中国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家庭经营适应了广大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促进了农业生产，但多是以手工操作，靠体力劳动为主，不能摆脱自然力的束缚。家庭生产、消费、养老和生育功能的强化，使农民家庭产生强烈的生育动机，因而与社会的生育控制相背离。必须进一步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转变传统生活方式，促进社会化服务，才能有效实现人口控制。

## 二、科技因素与人口控制

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在于科技革命。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一个较大差距在于前者的科学技术不够发达。高科技将会使人们告别贫困、落后、愚昧、野蛮，走向富裕、健康、智慧、文明。由于人类战胜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从而能够实现理想的低出生、低死亡、高寿命的现代稳定型人口状况。

(一) 优生学是现代科学发展的成果。要提高新生儿的素质，就必须研究遗传学、卫生学、医学、药理学、环境生态学等自然学科，同时还包括一些社会因素，如经济、宗教、民俗、政策法规、婚姻制度、道德观念等。由于优生学的创立，人们以科学为尺度，生育身心健康的婴儿成为家庭的追求目标——不求多生，只求优生。

(二) 科技进步是推动中国妇女生育保健条件改善的动力。解放以来，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很快，医疗科技成果不断问世。据卫生部统计，全国妇幼保健院从1949年的80个增至1991年的333个，妇幼保健所从1949年的9个增至1991年的2854个。接生条件亦有较大改善，1977年新法接生率为88.5%，其中市为98.2%，县为87.6%；1991年上升至94%，其中市为98.1%，县为97.2%。住院分娩率从1984年的41.4%上升至50.6%<sup>①</sup>。

<sup>①</sup> 朱庆芳主编：《社会保障指标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但中国科技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应用还不平衡。农村边远贫困地区由于缺医少药,妇幼保健工作相对比较薄弱。1990年卫生部对300个贫困县的调查结果表明,孕产妇死亡率高达202/10万人,婴儿死亡率高达68%,均高出全国平均数的1倍多<sup>①</sup>。

由于城乡差异较大,人口控制状况的对比度较大。全国儿童死亡率为3.7%,其中城市只有1.7%,县则高达4.2%。有医院设施的地方,儿童死亡率为2%;有诊所的地方则为3.9%;无医疗设施的地方高达8.2%<sup>②</sup>。数据表明,农村婴儿存活率及儿童存活率都低于城市。城市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较好,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城市大部分人容易接受。这是因为城市医疗条件好,药品有保证,婴儿和儿童存活率高,保险系数大。而农村则是以多生子女来加大保险系数的。同时科技发展较快的城市,妇女节育措施的实行较顺利。而在农村,特别是受封建迷信或宗教习俗影响较重的地区,实施节育手术十分困难,计划外超生较为严重。

### 三、文化教育因素与人口控制

受教育的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人口素质,而妇女受教育的程度关系到妇女地位的提高,也是衡量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由于母亲是幼儿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因而母亲的文化素质直接关系到社会人口的素质。在现代社会中,妇女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参与社会的机会越多。由于经济独立,政治地位提高,追求现代生活方式,使她们对现代生活质量的要求越高,生育率就越低。因此,提高妇女受教育水平是人口控制的重要因素。

中国人口众多,妇女人口居半,育龄妇女又在妇女人口中过半,但受教育的比例较低,使中国人口控制的形势十分严峻。根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国女性人口占总人口的48.5%;15~49岁的育龄妇女占女性人口的55.6%。15岁以上人口中的文盲和半文盲2/3是女性,而且在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中,男性占70%,女性只占30%<sup>③</sup>。

中国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与人口出生率成反比:

(一)年轻一代妇女文化程度高于老一代妇女,人口出生率呈下降趋势。据全国妇联199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资料,40岁以下妇女与其母亲一代比较,前者文盲半文盲为21%,后者则占72%<sup>④</sup>。全国人口出生率从1953年的37%下降到1982年的21.1%<sup>⑤</sup>。

(二)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据1990人口普查15岁以上人口文化程度状况比较,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女性占1/3,主要在城市。而文盲半文盲中,女性占2/3,主要在农村。中国城市家庭人口规模在逐年下降,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4.66人,1964年下降为4.11人,1982年继续降至3.95人,到1987年全国儿童抽样调查时为3.72人<sup>⑥</sup>。中国城市中领取独生子女证的育龄妇女占妇女总数的90%以上,而农村仅有40%左右<sup>⑦</sup>。目前农村妇女计划外超生、逃生、抢生的现象经常发生,女童失学率升高,成为新生文盲,人口素质前景堪忧。

(三)妇女文化程度越高,社会参与机会越多,从而改变妇女在家庭中的依附地位,摆脱把妇女单纯作为“生孩子工具”的桎梏。1982年女性在业人口占总在业人口的43.7%,

①② 朱庆芳主编:《社会保障指标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④ 谭深:《当代中国妇女状况的分析与预测》,《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3期。

⑤ 郭沧萍:《中国的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老龄问题国际讨论会文集》,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年版。

⑥ 郭崇德主编:《社会保障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

⑦ 风笑天:《论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社会特征》,《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1期。

1990年占45%；而解放前，据1940年统计，10岁以上女性人口中有正当职业的在不同地区只占1~9%<sup>①</sup>。目前随着职业妇女的增多，摆脱繁重的家务劳动，利用闲暇时间，获得个人发展的机会，进一步体现自身价值，成为现代妇女新的生活方式。因此，减少生育是职业妇女的心愿。

#### 四、社会保障因素与人口控制

发展老年社会保障是控制人口的有效途径。传统生育观是将多生子女作为养老保险的。目前农村老年人在丧失劳动能力以后，主要靠子女经济供养，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太小，而老年人一般体弱多病，为老年人提供服务，保护老年人的特殊需求主要落到子女身上。同时老年人精神生活单调，以享受天伦之乐为晚年生活乐趣，所以“养儿防老”、“多子多孙多后福”的观念仍很流行。

如何使人口得到控制？国外已有不少经验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证明：“老年保险是遏制人口增长的关键”。“德国是第一批实行法定的老年保险制度的国家之一，上个世纪的80年代，人口的年出生率为38%，到1975年，人口出生率已降为9.5%”。由于实行老年保险制度，丹麦、新西兰、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出生率都连续下降<sup>②</sup>。从中国情况来看，城市的社会保险发展程度比农村高，人口出生率比农村要相应低得多。因此，根据中国国情，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险，提供经济和医疗健康保障，加强养老社会服务，发展老年福利事业，解除老年人的后顾之忧，形成国家、社区、单位、家庭多元化保障体系，那么生育价值便从家庭走向社会，形成社会的低生育率。

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使国家政府的利益与家庭个人的利益达到协调统一，使宏观社会生育控制价值与微观家庭生育控制价值融合一致。美国学者卡伦·霍顿分析了社会保障、计划生育和人口出生率之间的关系，认为从政府角度出发，“政府办的社会保障计划，凡是给老年人提供了较大的安全保障和慷慨的福利的都将大大地降低儿女作为老年保险的价值，从而加快缩小家庭规模，使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从父母角度出发，“如果保险在经济上来说是非常有效的，父母将会购买更多而且比较便宜的安全保障保险。如果除了养儿防老之外，还有更安全可靠、更经济的途径的话，那末，‘养儿防老’的相对好处就消失了。这些其他途径包括通过市场提供的保险，公办的社会保险计划和父母私人储蓄积累的财产”<sup>③</sup>。这就是说，老年社会保障使子女养老价值降低，而社会养老价值增大。加之现代家庭对子女投入的成本越来越大，付出的精力越来越多。老年人希望得到子女平等的回报，但由于年轻父母多与老年人分居，年轻父母用在自己子女身上的投资超过对老年人的供养，而且工作忙，即使有孝心，也无孝力，老年人难以从子女那里得到经济、医疗、精神等诸方面的满足，便把希望寄托于社会保障上，“养儿防老”的观念逐渐淡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愿意人口得到合理控制，以不断提高和改善自身生活质量。

（本文责任编辑：朱 犁）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① 谭深：《当代中国妇女状况的分析与预测》，《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3期。

② 参见《德国的经验之谈》，《参考消息》1993年6月30日。

③ 卡伦·霍顿(美)：《社会保障、计划生育和人口出生率》，《老龄问题国际讨论会文集》，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年版。